

當代台灣性意識形態之派別與變化^{*}

一、本文要旨

在台灣同性婚姻的辯論中，我曾經區分過三種不同立場：保守派（反同婚派）、進步自由派（同婚派）與激進派（毀家廢婚派）。¹ 這三種立場也是台灣性意識形態場域裡長期存在的三方。保守派的背景乃來自宗教或者文化保守主義。進步自由派的背景緣起自由主義，陸續加入受害女權主義以及同性戀平權。毀家廢婚派（毀廢派）的背景則來自左派或激進派思想。

在這篇文章我主要講台灣性意識形態之派別與變化脈絡，這三個主要趨勢是：

（1）進步自由派的前身是保守自由派，但後來積極結合了同性戀運動、加入與推動同性婚姻運動，以及由於台灣內外形勢變化，而演變為進步自由派（不過始終含有受害女權派的保守內核）。

* 本文緣起於兩篇發言稿，第一篇構成我目前文章的大體思想，〈護家盟大遊行後的同婚政治〉，這是2014年1月3日「性權論壇」的發言，由性別人權協會在台北主辦。第二篇則和目前文章結構較為接近，最初版本是在「性／別廿年國際研討會」的「性／別廿年」座談的發言，台灣中央大學性／別研究室主辦，2015年5月16-17日。不久後我在「亞太地區第一屆皮繩愉虐情慾與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2015年5月13日）評論王琪君〈依然難以（公開）愉悅／逾越的性虐待／猥褻〉一文時成形為目前樣貌。之後曾分別在中國人民大學性社會研究所舉辦的研習營（2015年7月3日），以及台灣中央大學舉辦的性／別與科技人才培育營（2015年9月10日）作為演講文章內容。

1 參見卡維波〈台灣同性婚姻的三方爭議〉，刊登於本期《人間思想》。

(2)之前曾存在過保守自由派與保守派的共治時期，這個共治的轉軸接軌是受害女權話語，由此開啟了台灣的新文明教化與性別治理。由於共治時期以嚴刑峻法和道德情感壓制了脫軌邊緣的性，使得純淨化的同性戀運動得以被主流接納。在新道德主義清理性戰場後，使得自由派有了加入或甚至推動同性婚姻的條件，既能夠「進步」，又不失其受害女權的保守內核。受害女權主義的特色則是將傷害「黑洞化」，亦即，以受害為能量來源，以不斷受害(吸納能量)來壯大自身，卻因而永遠無力脫離傷害黑洞。

(3)解嚴後，保守派群眾沒有黨國出面而群龍無首後，默認新型保守派組織的領導，接受保守派與(保守)自由派的共治，但在自由派從保守轉變為進步後，保守派也分化為進步保守派(附屬於進步自由派)與基本教義保守派，後者成為反同婚的主力。本文有時將基本教義派稱為「復刻保守派」。

(在此需說明：由於基本教義派或原教旨派已經多少被汙名化，雖然我以中性意涵使用這名詞，但是有時則以「復刻」保守派來簡稱；「復刻」假設了自身在新時代複製已知的自我。另有「復歸」則假設返身向後發現未知的自我。故而，復刻保守派與復歸保守派有所不同。)

以上三點可參考下列簡表：

表一 當代台灣性／別派別的三方變化

保守自由派→進步自由派(加入同婚運動以吸納同運，保留受害女權內核)
保守派→基本教義保守派(世俗化的新型保守派融入體制，保守群眾投奔「復刻」保守派)
人民民主、性權派、性運→毀廢派、爛逼(從洋左酷兒到性／別研究之中國轉向?)

在這篇文章我主要討論自由派與保守派的變化，而不會討論毀廢派思路的前身與變化，因為後者涉及的超過性／別的範疇，所以留待其他文章處理。

文章的最後附記則提出：性政治立場區分為自由／保守／激進三派，但是耐人尋味的是：和這三種同樣屬於現代意識形態的派別還有民族主義，卻沒有明顯地涉入今日台灣性／別話語的討論中。這反映或意味著什麼？

二、台灣自由派從「保守」到「進步」的演變

我先說一件事，其實西方左派或激進派（毀廢派的思想來源）都是追求「進步」的，所以激進派和進步自由派都分享著「進步價值」，許多進步自由派的進步觀念乃來自激進派之鼓吹，甚至可以說：有一種「進步」是帶著激進性的，因為要徹底遠離保守性。因此在保守派的眼光裡，激進派與進步派這離地的兩派之區分不大。不過，當前我所謂的進步派，其主要思想根源是自由主義（所以我將進步派稱為「進步自由派」）。

然而，自由主義之中也有保守傾向者，是謂「保守自由派」。自由主義內部的進步與保守之爭一直長期存在，我認為之前台灣與美國大體上乃是保守自由派占主流支配地位，約2012年後（歐巴馬連任、蔡英文落選），保守自由派無法應付新自由主義全球化新局而退潮，進步自由派的態勢有著明顯的反轉上升——在西方，特別是美國推動同婚與同性戀平權的加強，許多主流同性戀積極分子都被吸納或獲准正式加入政府治理；同時，美國在對外宣傳方面表現出新一輪的文明開化或文明進步主義，在國際儼然成為另一波人權外交之宣傳，特別針對伊斯蘭的原教旨復興運動；²但是同時，歐巴馬因而也激化了美國內部的「自由－保守」撕裂之態，亦即，一方面美國的保守自由派思路退居亞流，另一方面，成為新主流的進步自由派則不再與保守派共治，並與保守派決裂；在一片進步（正確）政治氛圍中，保守派陷入絕地。這樣的價值意識形態決裂的發展則是沿著種族衝突、階級鬥爭、經濟兩極（所謂1%富對抗99%貧）、性／別麻煩的軸線展開。2016年川普的當選則引發美國離地進步自由派與美國絕地保守派的激戰。³

在台灣方面，為何自由派與美國一樣出現了從保守自由派消退到進步自由派抬頭的轉折呢？這是因為自由派（許多自由派公知同時是或轉向為台獨

2 甯應斌〈粉飾與同性戀民族主義之後〉，即將發表於《台灣社會研究季刊》。

3 落選的希拉蕊與其夫柯林頓典型地代表了美國保守自由派到進步自由派的轉變，例如1994當選的柯林頓總統在任內對軍隊同性戀採取了「不問不說」政策，是很典型的保守自由派政策。

派)在2012年蔡英文落選後，對扭轉台灣前途產生急迫性，要絕地反轉地調動社會激進反抗因素的運動與話語，同時也有著爭取西方認同的國際形象考慮，希望與西方全球化的新文明進步主義並肩齊步，以獲得對台灣國際地位的承認支持。同時，向西方進步靠攏也意味著和保守落後的傳統思惟(隱喻中國)切割，性／別進步的去傳統化，恍惚地悄然有去中國化的聯想。以上是台灣保守自由派轉為進步自由派的內外動力。這個動力使得台灣自由派更積極地與同性戀運動結合並加入推動同性婚姻，由此才真正蛻變為進步自由派。

晚近台灣自由派對自己的進步是自滿的，因為自認已經站在文明進步的頂峰，自身的正義已經無可置疑、是絕對真理，亦即，人類的文明進步史已經發展到終點了——畢竟還有什麼比自由民主、人民自決、性／別平等更正義或更真理的呢？這當然是其知識範式的井底盲點。⁴台灣自由派在為受害與弱勢代言時，與往昔不同的是其「進步」中有種激進性，而這如前述乃是來自面對中國崛起後的絕地感，不能再緩進或保守，只有更激越的進步才能走出絕地，這種外表強勢下的內在脆弱，表現為對自身進步的脆弱自滿。「脆弱的自滿」(fragile conceit)也是台灣民主與國族政治內在狀態的寫照——對自身政治表現洋洋自滿，但是卻對前景內荏悲怨與缺乏自信。以下我還會對此現象再三闡述解釋。

三、台灣保守自由派與保守派的共治——奠定性別治理的基礎

既然在當今進步自由派之前，還有個保守自由派，那麼我應該在此稍微講述一下之前台灣保守自由派的狀態。國府遷台後，由黨內到黨外逐漸聚攏了政治自由主義的反對派，不過這類自由主義者關注的是政治，在社會文化領域最多屬於開明派(李敖可能是例外)，也就是我所謂的保守的自由派，易言之，他們即使在政治領域可能非常進步(在解嚴後的環境中)甚至激進地推

4 這也是西方左派與自由派的井底盲點。我從中國派的視野解析了這個盲點。卡維波(2016)〈「中國作為理論」之前〉，《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第102期，頁227-254。

動政治民主自由等等，但是在社會文化領域裡，他們與保守派還是有許多交集的。這個交集的基礎造成了台灣在世紀之交開始了在性意識形態領域的保守自由派與新型保守派的共治。

上述這個自由與保守的共治既是解嚴後短暫激進狂飆年代的終結(背景是李登輝改換了舊國民黨黨國，開始新國家打造，建立台灣共識與秩序。從李登輝到馬英九這個新國家打造與共治涉及了相當複雜的、與性／別直接相關的新型治理術。⁵)，也是台灣女權的性論述為保守派代言的結果——女權主義雖然使用社運激進進步的語言，但是實質上與保守派在性議題(賣淫、性騷擾、色情、性侵、保護兒童、痛快癖等)之實質立場一致(例如查禁色情與賣淫嫖娼等等)。我將這種女權立場稱為「受害女權主義」。

四、受害女權主義將傷害「黑洞化」

受害女權主義的特色是將傷害「黑洞化」，這種傷害建構試圖從受害本身長出力量來壯大自己，亦即，受害為其力量或壯大的來源，為此則不斷處於受害位置因而能無盡地吸納能量，雖然因而能有更大權力，卻又要持續消耗更多，因為受害同時也是消耗能量的。於是這個「受害人－(女權)運動－台灣」雖然因為悲情被害位置而好像越來越強大，但是卻又更空虛地、無止盡地要更多的能量來填補——當然，最能提供能量的又莫過於受傷害，因而不斷地受傷害、且永遠無法脫離受害黑洞(因而脆弱)，才能造就了不斷壯大(因而自滿)。因此台灣進步派與台灣新國族政治總是表現出「脆弱的自滿」。

最能清楚解釋將傷害「黑洞化」的莫過於受害女權主義影響下的個人：受害者要將個人生命(身體與心理)與生涯史都以受傷害為中心來重新敘述，傷害的潛在破壞力是隨著這個敘述認識而越來越大，且和生命生涯史中的其他部分都產生內在的關連(例如童年的性侵不隨著時間而淡忘，反而要在當前

5 何春蕤曾以多篇論文深入分析此一現象，很可惜一直被忽略。現在已經集結出書，參見何春蕤(2017)《性別治理》，中壢：台灣中央大學性／別研究室。

氛圍中被不斷提醒與確定為父權結構的傷害，且要關連起人生或成長中的種種事件徵兆和性格心情），這樣自我建構的結果，固然使得生命生活中的一切都被調動起來，因著統一能量去對抗傷害而感覺自我強大，但是也建構出永遠無法閉合的傷口，傷害已經沒有時間性地瀰漫在人生與全身了。這個內在無止盡傷害的黑洞，投射到外部則是結構巨大恐怖的父權、男權、強姦、色情、性騷擾……甚至性權、性解放等等也是加害結構。這些結構乃受害女權運動的對抗對象。

和上述受害女性個人相類似邏輯的受害女權運動則是以結構的受害為中心的運動，也同樣地因為聚焦受害而不斷壯大，但是由於同樣地將受傷害黑洞化，故而需要從國家社會那裡不斷地取得更大權力，來對抗日益可怕的敵人——例如，只懲罰暴力強制性交是不夠的，還要法律懲罰沒明言徵求說「是」的合意性交——不，這也不夠，因為還有女方會說「是」的權勢性交與誘姦……等等。台灣受害女權運動還對應著受害的台灣國族心態（中國，「你好大我好怕」）——「四百年來」不斷受害的想像與敘述影響著台灣國族政治與許多社會運動。

五、自由派從保守轉型為進步的第一個關鍵：受害女權內核

以下回到文章的主軸：受害女權主義於李登輝執政末期的20世紀末在顯著的治安案件（彭婉如、白曉燕遇害）與諸如廢除台北公娼、性騷擾立法、兒少立法等，進入台灣新國家的治理，而且主導了這一時期的保守自由派傾向。正如前述，約2012年開始台灣的保守自由派受到國際趨勢（亟欲脫困的新自由主義全球化與對抗伊斯蘭）與台灣內部需要（積極加速台灣與國際文明接軌，加大進步的形象與力度來達到綠營重新執政目標），在雙重影響下轉為近年的進步自由派。不過，自由派能夠從保守成功地轉型為進步有兩個關鍵：

第一個關鍵就是其保存了受害女權主義的內核，這可以使許多骨子保守者能接受進步的外皮。更精確地說，在保守自由派與保守派的多年共治下，

已經以受害女權(連帶著極端保護兒少)的嚴刑峻法和道德情感(何春蕤所說的嬌貴化、零容忍、小心眼、報復、自滿等等)壓制了脫軌邊緣的各類性，使得純淨化的同性戀運動得以被主流接納(同性戀不是濫交、愛滋、偏差、吸毒、戀童，而是兩個相愛要結婚的負責公民)，在清理性戰場後，使得自由派有了加入或甚至推動同性婚姻的條件，既能夠「進步」，又不失其受害女權的保守內核。總之，在同婚議題上，台灣當前進步派部分內核的女權派元素，並沒有浮現與同性戀的衝突，基本都接受進步派的自由主義，這可以說是台灣從保守自由派轉向進步自由派的一個關鍵。

六、同運加入是第二個關鍵：因為性平教材與同婚或能帶來國家認可

第二個關鍵在上面已經提到了，就是在於進步自由派支持與進入同性婚姻運動，從而吸納了台灣同性戀運動的能量。可是這個吸納收編也有同性戀運動的主動，為何如此？台灣同性戀運動原本部分傾向激進派，或至少不同於保守自由派陣營，但是卻為何被自由派所吸納，從而促成自由派的進步轉型呢？我認為有兩個因素促成這樣的轉變：

一個因素是由於基本教義或復刻保守派對性別平等教育關於同性戀等部分的攻擊(紛爭也部分源於性別平等教育本身爭取國家認可的啟蒙教化策略)，另一個因素則是台灣同性戀認為同婚將帶來國家對同性戀之認可或去汙名(結果不幸地同婚運動反而戳破社會溫情、喚出反彈敵意)，而接受進步自由派的收編。

然而同性戀運動進入進步自由派陣營亦並非突變突發，由於李登輝後期台灣國族營造時的追求國際化，解嚴後的「支持弱勢」(道德進步主義的萌芽發展)，許多反對派政治人物也紛紛支持包括同志在內的弱勢，打造形象，配合了主流媒體對性的高度興趣，所以有1998至2003年之間同志運動急速地

取得正當性，⁶這不但是主流媒體上的同志運動，也是道德進步主義在保守自由派中逐漸滲透開展。⁷由於「支持弱勢」(婦幼、動物、殘障、同性戀等等)配合了國際化、西方國家的文明開化想像，所以同時在塑造民族－公民。由於此時仍是自由派與保守派的共治，在打造台灣民族－公民的性別治理中，道德進步主義對同性戀作為弱勢的容忍，其有限性還能夠被保守派所接受，此時進步與保守兩者的矛盾是被妥協與掩蓋的，⁸直到兩者共治結束後的同性婚姻運動中才迸發出來。

最後，對於進步自由派演變的總結：台灣的進步自由派可以說修辭與姿態變得進步，但是這主要是迫於情勢需要與風向潮流，其底細仍是保守自由派的本能，追究這種現象，有兩點可說：首先可以說政治自由主義在台灣原本就是來自國民黨內少數人對國共內戰失敗的反省，至於台灣本地應和政治自由主義者則多半只因為反對國民黨而興起，但是後來不少又走向台獨，偏離了政治自由主義，自由派的修辭往往被用來黨同伐異；至於社會文化的自由派有過李敖或現代主義文藝的相對激進時刻，但是西方六〇年代開始的激進文化運動基本被封鎖在外，因而台灣的社會文化自由派缺乏資源養分而最多只能表現反叛。第二點，雖然我用「自由派」指稱這個支持同婚派別的大致立場，但是其成分複雜，特別是來自台灣女權話語的影響。如前所述，女

6 朱偉誠(2008)〈同志·台灣：性公民、國族建構或公民社會〉，《批判的性政治：台社性／別與同志讀本》(朱偉誠編)，台北：台灣社會研究季刊，頁413-439。

7 道德進步主義認為世界越來越進步文明，暴力日漸消亡，這是進步主義的基調。在台灣與美國仍是保守自由派與保守派的天下時，居於亞流的進步自由派便鼓吹道德進步主義。

8 因為此時自由派與保守派的共治，既有道德進步主義、也有道德保守主義的成分，兩者形成「新道德主義」，這是新形態的教化(moralism)，因為同時是來自政治正確(進步)與道德正確(保守)的雙重教化。新道德主義乃是自由與保守共治之意識形態。新道德主義的這個新文明教化，既有性別平等、動物保護、環保等進步價值，也是婦幼的極端保護主義，也真正實現了蔣介石推行失敗了的新生活運動，諸如包括下層市民在內的全民禮貌與秩序、監控下層父母的教養子女方式。參見甯應斌(2013)〈現代進步觀及其自滿：新道德主義與公民社會〉，《新道德主義》，中壢：台灣中央大學性／別研究室，頁1-11。以及，甯應斌、何春蕤(2012)《民困愁城》，台北：台灣社會研究季刊，頁16-20。

性主義的性議題與受害立場構成了台灣保守自由派的重要成分，這一成分並未隨著其轉向進步自由派而消失，畢竟在美國歐巴馬－希拉蕊向世界推銷文明進步主義時，這個成分也始終存在，這一直是全球性別治理的重要成分。西方的反伊斯蘭陣營，一方面以同性戀權益攻擊伊斯蘭，另一方面也以性別平等的女權攻擊伊斯蘭。西方的進步自由派或進步文明主義主要表現在支持同性婚姻與LGBT權益（歐巴馬第一任時尚未如此明顯主張），但是其對於性騷擾、性工作、家暴、兒童之類議題仍然延續保守自由派立場，與性激進派明顯不同。台灣的進步自由派也是一樣。

因而除了同婚與LGBT議題外，台灣進步自由派在其他性受害議題方面仍然是受害女權主義與保守派影響之舊調。由於這種心虛或底氣不足的進步，故而一方面表現出十足自信正義正確、自認進步的自滿，但是另一方面對於「不進步」（如非教條主流的性騷擾說法或逆向思維）則表達出暴怒與歇斯底里仇恨等情緒，有時還想要封鎖或掩蓋較理性的保守言論，甚至遷怒於中性的報導新聞事實，顯示其自滿乃是非常脆弱的。

七、台灣保守派從「新型」到「復刻」的演變

上面提到當前進步自由派（同婚派）與基本教義保守派（反同婚派）的對立，而在此之前，卻是幾乎相反的情況，也就是保守自由派與新型保守派的共治（「新型」表示較為世俗化的、能操作媒體和立法游說的保守派）。下面需要略說明保守派的變化，也就是如何從新型保守派的興起演變到基本教義或復刻保守派的興起。

解嚴後一九九〇年代的「階級治理」以（1）政治與文化領域的本土化、（2）經濟產業的外移、（3）有限起步的社會福利，這三種路徑為手段，但是尚未更深入地觸及社會化（socialization）與家庭領域，尚缺乏後來「性別治理」的襄助成全。在這個解嚴後近十年激進狂飆的時刻，前衛話語隨著媒體競爭而激增，保守觀念遭到數十年來未有的挑戰（不只是何春蕤的「我要性高潮、不要性騷擾」之類，還有電視與報章雜誌狂熱的性討論與話題，女性情欲與同

性戀在BBS網路上紛紛現身)。原本依附國民黨政權的舊保守組織失勢，於九〇年代末期紛紛被新型的利益／公益團體取代，開始動員與凝聚原本因解嚴自由化而渙散且喪失話語權的文化保守群眾，過去這些群眾依賴國民黨威權國家直接出面巡衛保守價值，如今後威權國家則必須有民間NGO來推動保守立法與作為(否則沒有正當性)。保守群眾從失去國民黨國家的出頭代理，轉化為新型保守組織的代言牧領。⁹ 九〇年代末這時也逐漸開始了前述保守自由派與新型保守派共治的新道德主義時期(參見註8)。

然而，上述情勢到了2012年左右，當台灣的保守自由派轉變為進步自由派，新型保守派也為求主流地位而傾向為具有進步姿態、使用進步修辭的「進步保守派」時(完全融入體制，而無群眾性，等於併入或附屬於進步派)，這使得大批跟不上形勢、沒有掌握進步語言的保守群眾頓失所依，面對性別平等教育的同性戀教材以及同性婚姻運動，保守群眾只能集結於傳統教義的宗教團體，有著原教旨(基本教義)運動的傾向，但是面對現代進步語言，這批復刻保守派是失語的，只能以誇張扭曲方式來反對進步自由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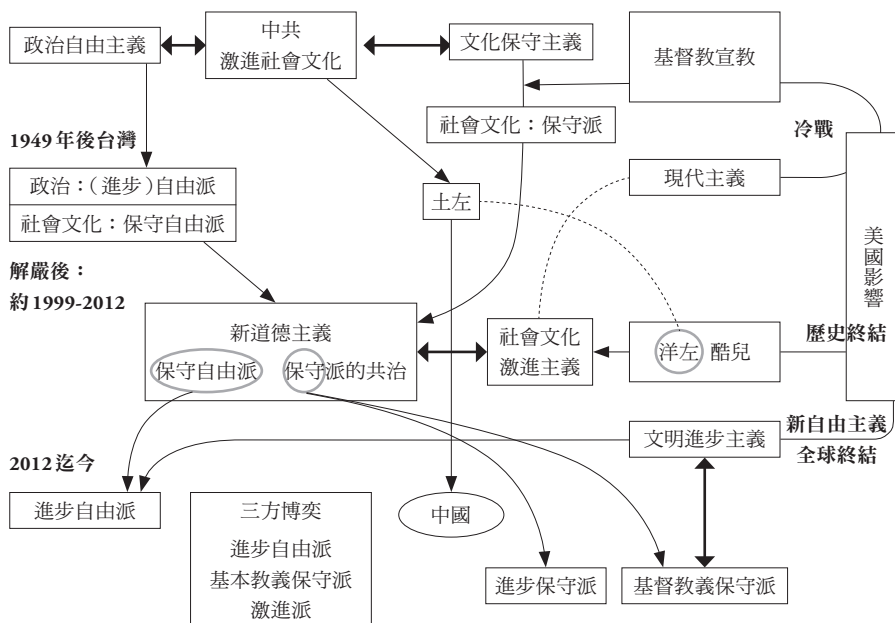
如果說在九〇年代尾至2012年左右，保守自由派與新型保守派共治的情勢下，保守自由派以女權語言來替保守派代言，那麼激進派為了對抗這種保守共治，在這個時期則不時以「激進自由主義」的修辭來替自由派代言，例如主張色情言論自由。言論自由本來是自由主義的立場主張，但是色情言論自由卻被保守自由派所放棄，故而激進派必須承擔與補上此一話語空缺，均衡社會文化場域的權力分布。¹⁰ 不過2012年之後，保守自由派衰落，進步自由派抬頭，保守派的繼承者成為失語的復刻保守派，此時進步自由派的話語權獨大，為了均衡話語權力分布的三方博奕，其實正是激進派應該改變策略並代言保守派的時機，以挽救社會公共領域被壟斷的危機。

更詳細的演變則是下表，只供參考，本文不加解釋，留待其他文章詳論。

9 甯應斌(2011)〈極端保護觀：透過兒少保護的新管制國家與階級治理〉，《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第83期，頁279-293。

10 中國革命時期，中國共產黨也曾以自由民主來批評國民黨政權，還有新民主主義的號召，替中國薄弱的民族資本代言。

表二 當代台灣自由、保守、激進意識形態的演變(雙箭頭表示敵對關係。單箭頭表示演變關係。虛線表示聯繫關係)



還有一點需要說明的是：在政治經濟方面，所謂的左派應為社會主義派，不過一般社會主義「老」左派缺乏話語理論資源來理解性／別這類（被狹隘地歸諸於）「文化」議題（「非階級」議題），因而又有新左派及諸如後馬克思

主義等等的發展；本文的「激進派」命名其實就表現出這樣的趨勢，就是左派分裂成關注階級經濟議題的社會主義派，以及關注諸如性／別等「文化」議題的激進派。

這篇文章考察了台灣三種性意識形態的變化趨勢，但是卻把三個派別的存在當作現成如此的理所當然，在以下的附記將指出這種思考框架的不足。

八、附記：三個意識形態的終結？

這篇文章以三種社會運動與政治立場的意識形態來考察台灣性政治場域的變化趨勢，這三種意識形態似乎由來已久而且自然存在，正如（據說）毛澤東所說，「凡有人群的地方，就有左、中、右」。但是這三種區分真的是自然存在，而非歷史存在（亦即，在歷史過程中出現且終至消亡）？「歷史存在」乃受歷史力量左右，而不像自然存在有其不變本質且自然區隔。事實上，左（激進、社會主義）、中（自由主義）、右（保守主義）在各國歷史發展中都有其各自不同面貌與軌跡，而且都不是界限分明的，三者有許多的交集匯通與串聯代言——這便是本文的立論根據，例如本文所提出的近年台灣保守自由派或者進步自由派，便是自由派汲取了保守派或激進（左）派的思路和話語。那麼，這些交集匯通或串聯代言的關係是偶然非常態的嗎？還是這三種意識形態歸根究底有同樣的深層基礎？

沃勒斯坦曾寫過一篇〈三種意識形態還是一種？現代性的虛假爭戰〉¹¹，他認為19世紀在西方（因應著法國大革命帶來的震動）依序出現的保守主義、自由主義、社會主義三種政治意識形態，其實都是現代（或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同一種世界觀產物，開始將改變視為常態，都堅持進步與生產力的價值，都仰賴國家的執行力量，因而三者有很多交集匯通與彼此串聯代言，常見的是自由主義與保守主義之連結共治（例如我前面提及的「保守自由

11 Immanuel Wallerstein. 1996. "Three Ideologies or One?: The Pseudo-battle of Modernity." In Stephen Turner (Ed.) *Social Theory and Sociology*. Oxford: Blackwell. p.53-69.

派」)，或者自由主義與激進(社會主義)之連結(例如我前面提及的「進步自由派」)，即便是保守主義與社會主義的連結，也似乎在冷戰時期的中蘇體制出現過；這說明了三者的互通性。雖然三者有些差異，例如三者對於改變的速度與限度有漸變緩變(保守主義)、適度改革(自由主義)、急進革命(社會主義)之分，但是基本上沃勒斯坦認為三者的內涵之核心主要還是資本主義世界體系本身所要求的進步(不斷改變)、生產力與現代國家能力，這些其實反映了自由主義的核心訴求，故而長期以來可以說自由主義是在全球層次上是最主要的、占支配地位之意識形態。¹²

沃勒斯坦說法讓人質疑的第一點是西方的自由主義思想(或許起初不是經濟的自由主義，而是政治的自由主義)應該在啟蒙時代便已經開始，為何說西方保守主義的出現先於自由主義？其實沃勒斯坦的企圖是想說「現代」這樣的世界觀(視改變為常態)乃法國大革命時被清楚地意識到，因而相應地產生了三種政治意識形態來回應這種「一切堅硬的都煙消雲散」¹³的現代，首先出現的是被大革命震驚而反動的保守主義，接著是與之對抗的自由主義，最後則是要加速自由主義或現代進程的社會主義。故而，三者顯著的差異在於對於變化的態度(從緩進到急進)。

沃勒斯坦還有一個較嚴重的問題或盲點，就是他沒有探究現代另一個非常重要的政治意識形態——民族主義。或許他的世界體系論對於民族國家為單位的思考有天然的抗拒。但是民族主義也曾分別和保守主義、自由主義、社會主義結合或代言，並和三種思潮有著同樣或甚至更重要的角色。限於篇幅，這方面的民族主義問題我留待其他文章探討，在此我只要指出：在台灣統獨意識高漲的情勢下，性／別爭議仍主要只表現為自由／保守／激進的分

12 難道在一九六〇至一九七〇年代的毛中國時代也是自由主義占支配地位嗎？一來，沃勒斯坦可能認為只要具有「將改變視為常態，堅持進步與生產力的價值，仰賴國家的執行力量」這些特點，就是自由主義的核心價值了。二來，他可能認為在資本主義世界體系下(全球世界層次都受制於資本主義規律)，不可能單獨存在一國不具備自由主義的核心價值。

13 “All That Is Solid Melts into Air”為馬克思語，Marshall Berman以之為書名來代表對現代的體驗，就是不斷流變，這類論述很多，像後來的liquid modernity等等。

歧，而無民族主義因素，這本身就是耐人尋味的。這應該和台灣討論性／別的理論資源都是來自西方現代，幾乎全盤接受美國文化與性／別爭議話語有關，畢竟在某些非西方地區的性意識形態爭議中，殖民主義、帝國主義、民族信仰、民族文化、西化歷史過程等等則是被聚焦的。

但是無論如何，沃勒斯坦的論點是有啟發性的，他的中心論點是：自由主義／保守主義／社會主義三種意識形態都是西方現代世界觀的意識形態，是以「改變－進步、生產力、現代國家」這些自由主義訴求為核心，故而自由主義在資本主義世界體系內一直占支配地位。我在另篇文章曾提到在全球知識生產層次，「當前真正從家庭到文化、政治、經濟、全球各環節都發展較系統思想者乃是自由主義，畢竟它是推展現代規畫與去傳統化的主流思潮與真實統治者，也在極大程度上造就了今日世界」¹⁴，這反映了西方現代在世界層次的力量，並且將保守主義、自由主義、社會主義三種意識形態，透過（知識文化的、政治的、經濟的）帝國主義與殖民主義，傳播遍布全球，使得非西方世界也相對應地產生這三種意識形態與派別。

由於這三種意識形態有個傳播到世界各地的過程，那麼必然也和各地的歷史過程相關，都是歷史存在而非自然存在。例如在中國，以我個人淺見，在帝國主義進逼的初期，晚清菁英的「中體西用」回應並不屬於這三種意識形態，而是屬於（我名之為）「中國派」的回應，可以說是世界帝國對崛起的世界經濟之回應，此時中國尚有與西方現代競逐的想法。但是洋務運動之後，全盤或激進西化抬頭，自由主義意識形態進入中國成為主導，之後大約在一戰後，社會主義被引進中國，後來居上成為知識青年之主流。中國保守主義的出現則是對於中共運動、激進西化，以及抗戰的民族危機的回應，出現最晚，這樣的順序不同於西方保守主義是最早在西方出現的思潮。這三者對台灣的影響與繼承發展，可以參考上面的表二，不在此詳述。

沃勒斯坦相信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由於結構性危機已經進入過渡期而將在大約本世紀中期崩潰，在這個過渡期逐漸地人們認為政治變化不再是常態或

14 甯應斌〈論保守派反對婚的合理性〉（尚未發表）。

必然，為了解釋與回應政治變化(對變化採緩進、改革、革命)的三種意識形態也將隨之終結，在其廢墟之上會是什麼樣新的體系或意識形態猶未可知。但是沃勒斯坦忽略了非西方世界在所謂「過渡期」卻可能會產生與西方現代競逐的新型意識形態(各類反西方中心論是這種趨勢的徵兆)，不但挑戰自由主義，也可能以新的方式串聯代言保守主義與社會主義，可能是一種復歸(不是復刻)世界帝國的世界觀。

在西方現代所支配的社會中，三種意識形態經常處於博奕狀態，勾連不同人群的政治鬥爭。一種意識形態的獨大往往壓縮某些群體的社會空間，獨大意識形態又往往是串連代言其他意識形態的結果，例如我正文提到晚近台灣的自由主義既有保守女權主義的內核，也吸納了激進派的修辭與姿態，從而在話語與文化霸權上能壓制失語的保守群眾(缺乏智識論辯)，也讓激進派贅語(只能覆誦進步自由派、要求更進步)與無語(無法溝通保守派)。激進派此時的博弈當然是要串聯代言保守派，這似乎是頗為困難想像的，但是並非沒有先例，像在知識上西方左派曾經串聯右派 Carl Schmitt 的思想，¹⁵ 或者，前面提到激進女性主義藉著反色情、反性等串聯代言了保守派的性政治立場。或者，再讓想像力馳騁一下，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以土地改革來串聯代言被視為最保守的農民。但是如果非西方的社會主義派最終要走出西方現代中心論或普世論，那麼原有的激進派或保守派或自由派的思想知識資源是不足的，必須從自身文明傳統以及現代道路之歷史經驗來進行理論化，顯示非西方既有其特殊性，也有其普世性，¹⁶ 以與西方現代進行競逐，或能以競逐現代來取代西方現代。

15 例如，Chantal Mouffe. 2000. *The Democratic Paradox*. London: Verso. p.36-59. 中文翻譯：珊妲·慕孚(2005)《民主的吊詭》(林淑芬譯)，台北：巨流，頁31-50。

16 參考卡維波〈「中國作為理論」之前〉(2016)，《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第102期，頁227-254。